

卷宗編號：168/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主題：

- 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 入境澳門次數不頻繁
- 不視申請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裁判書製作人
唐曉峰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168/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司法上訴人：(A)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經濟財政司司長

一、概述

經濟財政司司長(下稱“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或“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作出批示，不批准(A) (女性，下稱“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司法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I. 根據司法上訴人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收悉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第 OF/00xx/DJFR/2023 號公函，被上訴之實體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上作出批示，即“根據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並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3)項及第 3 款的規定，不批准申請人的續期申請”。

II. 根據被上訴之實體透過“被上訴之行為”表示同意採納並作為有關行為組成部分之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

當中建議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續期申請的理由主要是“鑒於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然而，按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資料顯示，申請人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經進行聽證程序，且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所指之各種情況，顯示上述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

III. 然而，除對“被上訴之行為”給予應有的尊重外，司法上訴人並不認同該“被上訴之行為”。

IV. 根據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當中指出司法上訴人向該局所提出之“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臨時居留許可申請(P00xx/2018)”已於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 日。

V. 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屬“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之人士可依據該法規之規定，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VI. 在本個案中，司法上訴人正是以屬“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之人士為依據提出申請並於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准臨時居留。

VII. 根據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之內容，當中指出：“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之規定，利害關係人應在臨時居留期間維持申請居留許可的前提或要件、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及在澳通常居住。”

VIII. 在保持充分尊重下，司法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述見解。

IX. 正如以上所述，司法上訴人是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第(三)款之規定以屬“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之人士為依據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而非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獲批居留許可。

X. 誠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是專門規範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其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的臨時居留制度，為特別法，第 16/2021 號法律(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是規範非澳門居民在澳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事宜的法律制度，為一般法。

XI. 根據一般法律原則，在規範一特定事宜時，倘同時存在適用的一般法及特別法，則特別法優於一般法 (*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

XII. 就俗稱“技術移民”的臨時居留許可審批及續期方面(以下簡稱“技術移民”)，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8 條第 1 款及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就“技術移民”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方面僅要求利害關係人維持在本澳以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受僱即可，並無規定必須在本澳通常居住。

XIII. 故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根本不可能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規定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以利害關係人通常居住作為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

XIV. 此外，不論是根據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所公佈之“續期或惠及申請審批分析要素”抑或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顯示，當中同樣只僅僅指出，“(...)在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期間，申請人須保持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管理人員及具特

別資格技術人員”為申請依據的人士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持續工作；以“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為申請依據的人士須按計劃落實、聘請員工人數合理、以及持續依法營運等(會根據申請個案的實際情況考慮)(...)”，當中並沒有對申請人提出更多要求及規範。

XV. 換言之，根據司法上訴人當初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所依據之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結合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的資料，當中僅要求獲批准臨時居留之人士須在臨時居留期間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只要獲批准臨時居留之人士在臨時居留期間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則應視為已遵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

XVI. 鑑於司法上訴人以“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作為依據於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准臨時居留時，是以受聘於“XXX 有限公司”履行“XXX”職務，因此司法上訴人被視為“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故此，只要此法律狀況仍舊維持，則應視為已遵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

XVII. 直至本司法上訴提交之日為止，司法上訴人一直是“XXX 有限公司”的“XXX”，而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當中亦指出司法上訴人仍受聘於同一僱主任職同一職位，基於此，司法上訴人一直保持當初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法律狀況。

XVIII. 考慮到司法上訴人仍保持當初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法律狀況，故其已遵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其所提出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理應獲得批准。

XIX.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雖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之規定的確有指出“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補充適用於按照本

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但當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

XX. 事實上·作為普通市民大眾(即使是受過法律培訓的市民)·很難從上述行政法規的規定聯想或知悉到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利害關係人·更何況是第 16/2021 號法律(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的規定。

XXI. 而作為居留許可審批部門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也從來沒有以任何方式告知司法上訴人有關“基於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之規定)·司法上訴人需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XXII. 根據第 13/2009 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第 4 條第 2 款之規定·“法律應有確定、準備和充分的內容·應清楚載明私人行為應遵守的法律規範·行政活動應遵循的行為規則·以及對司法爭訟作出裁判所應依據的準則。”

XXIII. 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且行政當局從來沒有明示告知有關要件的情況下·一般市民只能合理地只認為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之規定·在臨時居留期間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則應視為已遵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

XXIV.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居留許可申請途徑分為:

i) 經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申請「居留許可」[第 16/2021 號法律及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以及被第 16/2021 號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及被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廢止的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

ii) 經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居留許可」(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

XXV. 根據被第 16/2021 號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之規定，“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XXVI. 根據被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廢止的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4 條之規定，“基於下列原因，將引致居留許可失效：

(一) 不再符合申請居留許可的任何前提或要件；

(二) 出現按原則性法律及本行政法規規定引致許可不能維持的任何情況，尤其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XXVII. 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之規定，“屬下列情況，行政長官得以批示廢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一) 居留許可持有人在獲許可後：

(1) 出現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任一狀況，且相關犯罪可判處超過一年的徒刑；

(2)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而被判刑超過一次，不論相關刑罰幅度為何；

(二) 居留許可持有人在獲許可前曾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的法院判處刑罰或保安處分，但在申請時並無提及該事實；

(三) 居留許可持有人不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又或不再符合給予居留許可所定的任一要件、前提或條件。”

XXVIII.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述現行及已被廢止的法律及行政法規之規定，經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申請「居留許可」(以家庭團聚為依據的居留申請)，行政法規內有明確規定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期間必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XXIX. 然而，經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居留許可」所適用的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之中，沒有上述要求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期間必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通常居住的規定。

XXX. 在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沒有明確規定要求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期間必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下，不能合理期待利害關係人能知悉通常居住是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要件。

XXXI. 而且要指出的是，於 2005 年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出台時尚未制定第 13/2009 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澳門當時社會普遍認為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效力與第 4/2003 號法律(即相等於現行第 16/2021 號法律)的效力是同等的。

XXXII. 另一方面，根據尊敬的澳門終審法院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作出之第 17/2017 號合議庭裁判，當中指出在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規定補充適用第 4/2003 號法律(即相等於現行第 16/2021 號法律)的規定時，需考慮第 4/2003 號法律(即相等於現行第 16/2021 號法律)的具體規定與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立法意圖及擬達致的目標是否相容。

XXXIII. 事實上，在解釋及適用法律時均離不開《民法典》第 8 條之規定，根據《民法典》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法律解釋不應僅限於法律之字面含義，尚應尤其考慮有關法制之整體性、制定法律時之情況及適用法律時之特定狀況，從有關文本得出立法思想。”

XXXIV. 就“技術移民”方面，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是吸納有利於澳門發展的專業人才服務於本澳的企業，藉着居留許可來鼓勵優秀人才在本澳就業及發展，以解決本澳專才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

XXXV. 從上述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可見，“技術移民”的目的是吸納有利於澳門發展的專業人才服務於本澳的企業，故“技術移民”的申請人只要服務於本澳的企業有利於澳門發展，足以實現“技術移民”的目標及意義。

XXXVI. 在本案中，司法上訴人至今一直是“XXX 有限公司”的“XXX”，司法上訴人已完全實現“技術移民”的目的。

XXXVII. 事實上，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之規定)要求一般居留許可的申請人在本澳通常居住是因為第 16/2021 號法律(以及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所規定的居留許可一般是基於家庭團聚或探親等原因而批出的，故相關人士在居留許可獲批期間要在本澳通常居住方能體現該居留許可的目的，並不同於“技術移民”臨時居留許可的目的。

XXXVIII. 經分析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關於“技術移民”的立法思想後，考慮到該立法思想和其擬達致的目標與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要求利害關係人在本澳通常居住所作之考量並不相容，經系統性解釋後，在“技術移民”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方面，根本不可能透過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之規定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第 16/2021 號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

XXXIX. 基於此，被上訴之實體錯誤解釋及適用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之規定，繼而錯誤解釋及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沾有法律適用錯誤之違法瑕疵，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第 125 條之規定，“被上訴之行為”應予以撤銷。

XL. 正如以上所述，被上訴之實體認為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應不獲批准的依據，主要在於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根據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之尤其以下內容，繼而認為反映司法上訴人未在本澳設有慣常居所及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4) 透過治安警察局提供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資料，顯示申請人在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每年留澳日數分別為 10 日、13 日、0 日

及 0 日，期間共入境 23 次，每次入境本澳後均於即日離境，自 2019 年 10 月 4 日離境後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未有再次入境本澳的記錄，期間相隔 22 個月。從上述出入境記錄顯示，申請人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大部分時間不在澳門；

(5) 申請人透過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申報其本人現居於“香港 XXX”（見第 1 頁），再配合申請人入境本澳的期間及次數，反映申請人未在本澳設有慣常居所；

(6) 申請人表示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澳門和香港的之間的入境限制政策，導致大部分時間不在本澳。須指出的是，申請人只需要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及要求便能入境澳門，再者，根據申請人 2019 年的出入境紀錄，整年留澳日數亦只有 13 日，即使在疫情爆發前申請人亦長時間不在本澳，客觀反映，疫情並非妨礙申請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在本澳通常居住的原因；

(7) 被授權律師指出，申請人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大半生都在香港生活，可見申請人在香港有很多責任和利益，無論是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專業或商業利益等。須指出的是，申請人自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自該日起已具條件在本澳開展日常事務，然而，透過是項申請所提交的文件，除了受聘於本澳僱主外，未能體現申請人與本澳存有更多的連繫，反映其日常事務圍繞香港開展，並以香港為生活中心，因己意不在本澳居住及生活屬個人選擇，不屬於合理障礙；

(8) 正如被授權律師所引述的司法判決的觀點，“通常居住”為一不確定概念，而對於是否滿足這一不確定概念，則須由行政當局按照具體情況作出價值性評價及衡量。然而，經按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作分析，未能證實申請人在本澳通常居住”。

XLI. 除對“被上訴之行為”的上述見解和結論給予應有之尊重外，司法上訴人基於以下依據而不表認同。

XLII. 誠然，不論是第 16/2021 號法律抑或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以及

被第 16/2021 號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及被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廢止的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當中並沒有對通常居住作出詳細定義·甚至是任何逗留日數的要求。

XLIII. 通常居住屬於不確定概念·必須由適用法律者去對其進行解釋·而對於被上訴之實體解釋通常居住此一概念及得出司法上訴人不在澳門通常居住此一結論方面·在保持充分尊重下·司法上訴人實在未能認同被上訴之實體的見解。

XLIV. 司法上訴人認為在解釋第 16/2021 號法律第二款第(三)項之規定(以及被第 16/2021 號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之規定)關於通常居住的概念時·可參考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關於通常居住的規定·因兩者都是處理行政程序中關於居留權的概念。

XLV.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之規定·

“一、本法律規定的通常居住是指合法在澳門居住·並以澳門為常居地·但本條第二款的規定除外。

二、處於下列情況之一的人士·不屬在澳門居住:

(一) 非法入境;

(二) 非法在澳門逗留;

(三) 僅獲准逗留;

(四) 以難民身份在澳門逗留;

(五) 以非本地勞工身份在澳門逗留;

(六) 屬領事機構非於本地聘用的成員;

(七) 在本法律生效以後根據法院的確定判決被監禁或羈押·但被羈押者經確定判決為無罪者除外。

(八) 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三、為著第一條第一款(二)項、(五)項、(八)項或(九)項所指的人士永久性

居民的身份，及第二條第二款所指的居留權的喪失，如有任何人暫時不在澳門，並不表示該人已不再通常居住於澳門。

四、在斷定上述人士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及他不在澳門的情況，包括：

- (一) 不在澳門的原因、期間及次數；
- (二) 是否在澳門有慣常住所；
- (三) 是否受僱於澳門的機構；
- (四) 其主要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所在。

五、本法律第一條第一款(八)項、(九)項所指的人士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是指緊接其申請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之前的連續七年。”

XLVI. 此外，根據尊敬的澳門終審法院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作出之第 106/2019 號合議庭裁判指出：“二、在判斷某人是否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時，此處所提及的通常居住地是一個完全受法院審查的不確定概念，因為不涉及任何預判。三、正如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那樣，暫時不在澳門並不表示該人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行政當局有義務查明利害關係人是否雖然人不在澳門，但仍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

XLVII. 尊敬的澳門終審法院亦同樣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作出之第 190/2020 號合議庭裁判作出同樣理解，其指出：“二、(在查明某人是否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時所提及的)“通常居住地”是一個可以被法院審查的“不確定概念”。三、僅從一名之前獲批在澳門的居留許可的人士“暫時不在”澳門的事實中並不能必然得出他已經不再“通常居住”於澳門的結論。”

XLVIII. 根據上述第 8/1999 號法律以及所引用之澳門終審法院作出之見解，僅從一名之前獲批在澳門的居留許可的人士“暫時不在”澳門的事實中並不能必然得出他已經不再“通常居住”於澳門的結論，以及在斷定上述人士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及他不在澳門的情況。

XLIX. 誠然，司法上訴人於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 日。

L. 始料不及的是，2019 冠狀病毒疫情自 2019 年開始爆發，基於疫情原因，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訂定以下防疫政策：所有外國旅客禁止入境，而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旅客，尚在入境澳門之前 14 天內曾經到過香港、台灣，可以入境，但是入境後要接受 14 天指定地點醫學觀察。

LI. 同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同樣訂定類似的防疫政策，尤其是倘若在入境香港之前 14 天內曾經到過澳門，入境後要接受 14 天指定地點的醫學觀察。

LII. 不論是香港抑或澳門，當時預約隔離酒店極為困難，通常需提前一至兩個月時間進行預約，所需的總時間遠超隔離所要求的時間。

LIII. 司法上訴人雖然是聘任為“XXX 有限公司”的“XXX”，但是“XXX 有限公司”屬於“XXX 集團”旗下，而“XXX 集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分別設有全牌照商業銀行、人壽及一般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在兩地均經營多項業務，司法上訴人除了需要處理“XXX 有限公司”的工作外，亦需要同時協助處理與“XXX 集團”相關的業務，為著更好處理集團業務，促進兩地金融業務融通，司法上訴人一般經常需於港、澳兩地穿梭來往。

LIV. 考慮到上述兩地的防疫政策，倘若司法上訴人選擇在此情況下仍然兩地穿梭來往，不得已須多次在入境後接受為期 14 天的指定地點的醫學觀察。

LV. 倘若司法上訴人多次耗時 14 天的指定地點的醫學觀察才能入境香港或澳門，而所需的時間成本亦如此之大，均有可能因此對“XXX 集團”，甚至是“XXX 有限公司”的業務造成延誤並造成重大影響。

LVI. 除此，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期間，不論香港及澳門政府均一直鼓勵市民減少聚集及避免外遊。

LVII. 另外，司法上訴人作為“XXX 集團”旗下之“XXX 有限公司”之

“XXX”，因受到“XXX有限公司”作出之工作指示，大部分時間被指派到香港及內地處理公司業務，但在司法上訴人“暫時不在澳門”期間，仍舊有持續處理“XXX有限公司”於澳門之業務，例如：幫助銀行提出了新的想法和項目，協助對澳門居民進行免費培訓，並一直負責推動社會福利項目，包括為殘疾人士提供設施的新分行，這使銀行成為澳門第一家提供有關服務的銀行機構；同時響應、投資援助計劃和政府大灣區發展計劃的項目，在澳門設立保險公司以及於 2021 年在橫琴開設分公司。

LVIII. 同時，由於司法上訴人的家人居住在香港，司法上訴人需花費時間陪伴及照顧。

LIX. 基於以上情況，司法上訴人只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而選擇“暫時不在澳門”，而留在香港處理家庭及兩地的公司業務。

LX. 為此，司法上訴人雖然在獲批准居留期間長時間不在澳門，但只因上述的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之不可抗力情況導致“暫時不在澳門”。

LXI. 需留意的是，司法上訴人恰恰與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作出之第 268/2021 號合議庭裁判中的個案類同，澳門中級法院合議庭在針對該個案的合議庭裁判中尤其指出，學理上認為，通常居住地指的是一個人通常居住的地方，是他在離開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後習慣返回的住所，然而一個人長時間出現在何處或是在哪裡過夜並不是判斷通常居住地的唯一和絕對標準，因為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接受職業培訓或進修，因工作關係而被派駐到外地的分公司，因患病而在外地住院接受治療，因未成年子女的健康問題而須前往外地對子女進行照顧等)，相關人士可能會離開澳門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可能超過六個月，但此時應認為他仍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

LXII. 此外，上述合議庭裁判亦指出，因疫情這個不可歸咎於自身原因而暫時不在澳門，考慮到疫情在全世界的傳播而作出暫不回澳的決定並不是不會邏輯和不正常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首先考慮到的一定是健康和 safety，因此在

這段時間不在澳門是有合理理由的。

LXIII. 換言之，不論是根據上述第 8/1999 號法律抑或引用之澳門法院作出之見解，行政當局並不應得出司法上訴人並非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以及不是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及開展日常事務的結論，司法上訴人因上述的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之不可抗力情況導致“暫時不在澳門”是屬於合理理由，司法上訴人仍以澳門為通常居住地。

LXIV. 除此之外，倘若通常居住此一概念必需限於要在本澳擁有居所及在本澳留宿的話，在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應要求申請人提交在本澳的住宿證明，比如在本澳是否擁有不動產或租約。

LXV. 再者，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第(二)項僅將在澳門是否有慣常住所列為考慮是否通常居住的其中一個因素，而非必要因素。

LXVI. 此外，司法上訴人持有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推定在本澳通常居住。

LXVII. 另一方面，本司法上訴之文件一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第 OF/00xx/DJFR/2023 號公函指如對“被上訴之行為”有異議，可依法在 30 天內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LXVIII. 換言之，被上訴之實體實際上亦認為司法上訴人是常居在澳門，方會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5 條第 2 款 a)項之規定指司法上訴人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為 30 日。

LXIX. 綜上所述，被上訴之實體錯誤解釋及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二款第(三)項及第三款關於通常居住的概念(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沾有法律適用錯誤之違法瑕疵，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第 125 條之規定，“被上訴之行為”應予以撤銷。

LXX. 根據上述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製作之第 00xx/2018/01R 號建議書之內容，其指司法上訴人於提交是次續期申請時，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

留許可申請書”中申報其本人居住在“香港 XXX”。

LXXI. 要注意的是，當時在審批首次臨時居留申請時，司法上訴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中申報居住在“香港 YYY”，被上訴之實體並沒有以此審查司法上訴人是否在本澳通常居住，而司法上訴人隨後於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准臨時居留。

LXXII. 然而，司法上訴人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起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在申請書上申報居住在“香港 XXX”，被上訴之實體卻以此審查司法上訴人是否在本澳通常居住。

LXXIII. 事實上，不論在首次申請及是次續期申請上，司法上訴人一直在申請書上申報的都是位於香港的地址。

LXXIV. 倘若被上訴之實體認為司法上訴人必須要在本澳擁有居所或留宿方符合通常居住此一要件，在首次申請時司法上訴人已如實申報有關住址時，被上訴之實體應即時以司法上訴人並非通常居住在本澳而否決其申請。

LXXV. 然而，被上訴之實體並沒有否決司法上訴人的申請，更批准其首次臨時居留申請。

LXXVI. 此令到司法上訴人產生正當期待及信任，深信其已符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要件。

LXXVII. 事實上，要重申的是，正如以上所述，被上訴之實體在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時，尤其是作為審批部門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均沒有向司法上訴人解釋通常居住必須要在本澳留宿，當中僅要求司法上訴人必須維持申請獲批時所考慮的重要法律狀況。

LXXVIII. 再者，根據司法上訴人在最初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時所填寫之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當中亦僅籠統地於該申請書第 10 部分之

“申請人之聲明”的第(1)點中提及“本人已知悉自提交申請之日起直至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均須遵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並沒有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利害關係人，更何況是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

LXXIX. 然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卻突然於嗣後對其所提供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的內容作出修改，根據司法上訴人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是次續期申請時所填寫之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當中不但於該申請書第七部分之“申請人的聲明，同意及授權書”中保留第(1)點的內容，更新增了當中的第(12)點，其指出：“I understand that Paragraph 3 under Article 9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no. 4/2003 stipulates that residing in Macao as an ordinary resident is a requisite for maintaining the temporary residency, and that the temporary residency might be invalidated if this requirement is not fulfilled. (中文版本的條款為：本人知悉根據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3 款規定，“利害關係人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否則可導致居留許可失效。)”

LXXX. 從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嗣後所作出之上述變更可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明顯知悉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之申請人(包括司法上訴人)，並不知悉及理解會對其所補充適用的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為何，當中尤其不知悉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會對其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才會在嗣後的申請書中作出並加入有關調整。

LXXXI. 但遺憾的是，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並無保護司法上訴人既有之權

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不但在司法上訴人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臨居留許可申請”的過程中亦從未向司法上訴人告知，現行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司法上訴人之外，在獲批臨時居留期間，尤其作出了上述調整後，亦從來沒有向司法上訴人以任何方式作出告知或提醒。

LXXXII. 因此，站在司法上訴人的角度，正常的理解是，只要臨時居留期間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則應視為已遵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而不會知悉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司法上訴人，更何況是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三)項及第 3 款之規定(以及被該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 3 款之規定)。

LXXXIII. 另外，根據澳門廉政公署的《貿易投資促進局審批“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的調查報告》之第 22 至 24 頁當中的內容，曾指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未以有關“技術移民”人員留澳時間的長短，作為是否批准臨時居留續期的依據，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內部法律意見認為，現行法律推定澳門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在澳門通常居住，且投資居留法並沒有將申請人留澳期間作為“技術移民”申請的審批要件，因此在處理臨時居留的續期申請時，不會審查申請人是否在澳居留及居留時間的長短。

LXXXIV. 基於此，行政當局違反了司法上訴人對當局的信賴，在司法上訴人無過錯的情況下，從未向司法上訴人告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司法上訴人之外，在獲批臨時居留期間，亦從來沒有向司法上訴人以任何方式作出告知或提醒，相反地如今突然作出不予

批准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決定。

LXXXV.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4 條之規定，鑑於司法上訴人於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仍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因此對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合理期望應受到保護。

LXXXVI.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之規定，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行政當局與私人均應依善意原則行事，司法上訴人於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中並無過錯，反之是行政當局從未向司法上訴人告知現行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之關於入境、逗留及定居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以及當中的哪些條文補充適用於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司法上訴人之外，在獲批臨時居留期間，亦從來沒有向司法上訴人以任何方式作出告知或提醒，故司法上訴人對本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合理期望應受到保護。

LXXXVII. “被上訴之行為”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4 條規定之謀求公共利益原則及保護居民權益原則，以及第 8 條規定之善意原則，因此，有關行政行為應被撤銷。

LXXXVIII. 此外，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度原則：“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LXXXIX. 行政當局作出決定時，如出現與私人之權利或利益出現對立的情況下，應遵從“適當原則”及“適度原則”，作出合理及合適之決定。

XC. 必須強調的是，根據上述的分析，司法上訴人的情況完全符合批准有關居留續期的前提，故此，不應對司法上訴人作出不予批准的決定。

XCI. 同時，值得指出的是，司法上訴人為“XXX 有限公司”的“XXX”，“XXX 有限公司”是於澳門註冊的全牌照商業銀行，不但自身擁有大量的客戶群，近年更積極發展金融科技，致力開設社區分行，普及基層人群，真誠踏實提供服務。

XCII. “XXX 有限公司”更發揮在粵港澳地區的區位優勢以及在葡語系國家的平台優勢，努力建設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紐帶，為粵港澳三地以及葡語系國家的各類客戶和項目提供全方位跨境金融服務，支援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為大灣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XCIII. 由於司法上訴人作為“XXX 有限公司”的“XXX”，經常於中、港、澳三地穿梭來往，以便處理銀行業務，以及鑑於司法上訴人所作出之決定均可能對“XXX 有限公司”造成重大影響，故司法上訴人須時時親身到澳門處理涉及“XXX 有限公司”的所有大小事宜。

XCIV. “被上訴之行為”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續期，必然令到司法上訴人不能任意進入澳門以處理“XXX 有限公司”澳門的所有業務。

XCV. 要重申的是，根據以上所述，“XXX 有限公司”在澳門享負盛名，已具有良好商譽及相當顧客，一直為澳門的金融業付出了一定貢獻。倘若不批准作為“XXX 有限公司”的“XXX”的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續期，將不可避免地妨礙“XXX 有限公司”於澳門的業務發展，這樣不但使“XXX 有限公司”可能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可能對澳門金融業的國際形象造成一定影響。

XCVI. 除此，司法上訴人自身於業內具有一定聲譽及知名度，“被上訴之行為”不批准其居留許可續期，繼而產生上條所指的情況下，除對“XXX 有限公司”及澳門金融業的國際形象造成巨大影響外，同時亦會嚴重損害司法上訴人多年來所建的聲譽及知名度。

XCVII. 誠然，“被上訴之行為”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續期，除違反法律規定之適用前提外，該決定更會對司法上訴人、“XXX 有限公司”及澳門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

XCVIII. 基於此，“被上訴之行為”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續期，對司法上訴人、“XXX 有限公司”及澳門帶來極大的不利後果及影響。

XCIX. 因此，“被上訴之行為”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規定之

適當及適度原則，有關行政行為應予以撤銷。

C. 綜上所述，“被上訴之行為”因違反一系列應遵的行政法原則而沾有違法瑕疵，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第 125 條之規定，“被上訴之行為”應予以撤銷。

綜上所述，向法官 閣下請求如下：

1) 基於“被上訴之行為”沾有法律適用錯誤之違法瑕疵，撤銷“被上訴之行為”；或

2) 基於“被上訴之行為”違反本起訴狀內提及的一系列行政法原則，撤銷“被上訴之行為”。

3) 傳喚被上訴之實體，並命令被上訴之實體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55 條第 1 款之規定，提交相關的行政卷宗。”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在答辯時提出了以下結論：

“一、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作出的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決定不沾有司法上訴人所指的瑕疵。

二、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有關通常居住於澳門的規定適用於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

三、除了遵守特別法(即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所要求的維持獲批居留許可前題之外，司法上訴人及其惠及的家團成員亦應遵守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

四、因為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第 23 條明確規定補充適用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當中包括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五、承上，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明確規定，居留許可

持有人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否則其居留許可得被廢止。

六、根據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2 條第 2 款，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續期取決於其是否符合規範居留的一般原則性法律及法規的規定，在本個案尤指以上有關必須在澳門通常居住的規定。

七、行政當局作為法律適用者，必須先對具體的事實情況作出綜合評價，方能判斷具體情況是否符合法律上項法律規定的前題。

八、為分析是否符合通常居住，除了考慮個人的居住地點以外，還關乎個人的生活中心及其在該地建立的各種(法律)關係，且該等關係必需是“實際且固定的”(efectivo e estável)。

九、司法上訴人指受疫情通關措施阻礙來澳，然而，一直以來澳門居民從未被禁止進入澳門，這是眾所週知的事實。

十、疫情開始至今一直有澳門居民往返香港/內地，可見疫情並非影響司法上訴人從香港/內地到澳門的阻礙。

十一、再者，雖然司法上訴人指因工作原因到香港或內地處理業務，但從未提出具體詳情或適當證明有關需要，故未能認定有關原因的合理性。

十二、反之，只見其屬因個人意願將生活中心維持設於澳門以外的地方。

十三、從司法上訴人的留澳天數、不在澳的理由及其生活中心等事實可反映出司法上訴人客觀上根本未在澳門展開其個人生活，亦未與澳門建立任何實際且固定的聯繫，故不符合有關常居澳門的要求。

十四、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及投資居留制度的核心價值，倘違反居留許可前題，居留許可應予廢止。

十五、司法上訴人並不應透過過往的續期產生合理期待，亦不應明知道其居留並未符合法律規定而產生僥倖心態。

十六、司法上訴人為著維持其獲批的居留許可，應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違反法律的行為並不因為時間過去或行政當局沒有執法而變得合法化，亦不可能

對之產生正當期望或信任。

十七、本個案中，在司法上訴人未在澳門通常居住，行政當局按法律規定執法，並未見任何明顯或嚴重錯誤，故並不違反善意原則和適當及適度原則。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的理由不成立，並駁回本司法上訴。”

*

司法上訴人提交了非強制性陳述，並重申了其在該案件中的立場。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二、理由說明

根據本案卷宗及行政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確認以下對審理本司法上訴案屬重要的事實：

司法上訴人以具備專業資格及經驗的管理人員身份，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了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其後，於 2018 年 9 月 3 日首次獲得臨時居留許可，該許可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 日。

2021 年 8 月 27 日，司法上訴人向當局提交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經查核司法上訴人的出入境記錄資料，結果顯示司法上訴人在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每年在澳停留的天數分別為 10、13、0 及 0 天。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工作人員於 2022 年 8 月 23 日編制了

編號為 00xx/2018/01R 的建議書，內容如下 (詳見卷宗第 23 至 25 頁)：

“事由：審查臨時居留申請

居留事務處經理：

1. 利害關係人身份資料如下：

序號	姓名	關係	證件/編號	證件有效期	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首次提出惠及申請日期
1	(A)	申請人	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 XXX	不適用	2021/09/03	不適用

2. 申請人(A)於 2018 年 9 月 3 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 日，其後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提出是項續期申請。

3. 為續期目的，申請人提交勞動合同證明文件及有關文件，顯示如下(見第 16 至 42 頁)：

僱主名稱: XXX 有限公司 (見第 31 頁)

聘用職位名稱: XXX (見 17 及 39 頁)

基本工資: 80,000.00 澳門元 (見第 33 頁)

聘用日期: 自 2019 年 1 月 10 日起任職，勞動合同為不具期限(見第 28 及 31 頁)

4. 於是次續期申請文件審查，發現申請人仍受聘於同一僱主任職同一職位，且其基本工資維持在 80,000.00 澳門元，高於 2022 年第 1 季銀行業外地管理人員的薪酬平均數 65,130.00 澳門元，現勞動合同為不具期限，並已依法申報/繳納職業稅。

5. 本局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透過第 OF/0xxx/DJFR/2021 號公函向治安警察局索取申請人的出入境紀錄及有關資料如下(見第 43 至 48 頁)：

日期	申請人的留澳日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1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3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0

註: 申請人自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自該日起計算，有關年度的留澳日數為 10 日。

根據申請人的上述出入境記錄，不足以顯示其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以澳門作為生活中心，因此，將不利於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6. 基於上述情況，本局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對上述利害關係人進行了書面聽證程序(見第 54 至 55 頁)，其後，申請人透過被授權人 xx 律師於 2022 年 4 月 11 日提交了書面回覆意見(見第 56 頁至 133 頁)，有關內容主要如下:

(1) 被授權律師指申請人是以特別有利於本澳的管理人員為依據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申請人目前繼續仍受聘於“XXX 有限公司”履行“XXX”的職責，其獲支付有關薪酬，因此，申請人的職務並沒有任何變化；

(2) 被授權律師指申請人基於其職位、知識、個人履歷及資格已獲批首次臨時居留許可，因此，本局現時不能認為申請人未有透過經驗傳承為本澳帶來特別的貢獻；這將是對申請人的職位、知識、技術、資格、職責等重新解釋，否則違反了善意原則；

(3) 申請人負責營銷計劃，在過去幾年中，申請人在澳門的營銷工作計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幫助銀行提出了新的想法和項目，協助對澳門居民進行免費培訓，並一直負責推動社會福利項目，包括為殘疾人士提供設施的新分行，這使銀行成為第一家提供這些服務的銀行機構。同時，申請人響應、投資援助計劃和政府大灣區發展計劃的項目、在澳門設立保險公司以及於 2021 年在橫琴開設分公司。另外，申請人最近被提名為香港 2021 年保險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4) 在現時各個方面的銀行界業務都使用了無數的通信技術，申請人可使用通信技術履行職務，事實上，甚至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前，銀行和金融業的大部分商業活動都是在遠距離進行的，並且大量使用了通信技術。

(5) 如上所述，申請人大部分時間不在澳門的原因完全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影響，以及澳門和香港之間的入境限制政策，任何前往香港以外地區的旅行都可能對申請人的健康和福祉構成高風險。顯然，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決定留在香港，是為了遵守政府的建議，以避免病情蔓延，以及在往返澳門和香港之間產生任何健康危害。由於旅行限制和健康安全建議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旅行，數千名其他澳門居民也處於同樣的境地。因此，這就是申請人不在澳門的原因。

(6) 必須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及為避免其傳播而實施和建議的所有措施完全超出了申請人的控制範圍，因此顯然是不可抗力的特殊情況。僅憑這一事實，如果沒有其他原因，申請人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無論時間範圍、頻率和次數如何，都必須被視為合理。

(7) 申請人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大半生都在香港生活，可見申請人在香港有很多責任和利益，無論是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專業或商業利益等。

(8) 大灣區計劃旨在改善民生，不僅將大灣區發展成為一個共同的優質生活圈，同時也促進所有居住在大灣區人士的發展，讓他們能抓住這一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帶來的機遇，從這個意義上說，申請人只是盡量利用大灣區計劃為其作為香港和澳門居民提供的機會，本局應考慮到這一點，並引用了 2021 年 4 月 22 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領導小組會議的官方通報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總體規劃綱要》。

(9) 根據《基本法》第 33、35 及 37 條的規定，澳門居民享有境內遷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上述均為不可忽視的基本權利，所以不可視申請人為沒有在本澳通常居住；

(10) 最後，被授權律師引用了第 106/2019 號終審法院的判決及第 473/2019 號和第 268/2021 號中級法院的判決，並指出在判斷申請人是否在澳門通常居住時，所提及的通常居住是一個完全受法院審查的不確定概念，且通常居住並不受限於申請人是否居住在本澳。

7. 就上述回覆意見，茲分析如下：

(1)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之規定，利害關係人應在臨時居留期間維持申請居留許可的前提或要件、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及在澳通常居住；

(2) 為確保利害關係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論在有關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審批期間或已批准有關續期申請，本局有義務對於利害關係人是否維持法律所規定的要件作出調查，及在證實利害關係人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時依法作出取消或宣告失效的行政行為，或不批准有關續期申請。

(3)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在斷定利害關係人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及不在澳門的情況，包括：(一) 不在澳門的原因、期間及次數；(二) 是否在澳門有慣常住所；(三) 是否受僱於澳門的機構；(四) 其主要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所在；

(4) 透過治安警察局提供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紀錄資料，顯示申請人在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每年留澳日數分別為 10 日、13 日、0 日及 0 日，期間共入境 23 次，每次入境本澳後均於即日離境，自 2019 年 10 月 4 日離境後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未有再次入境本澳的紀錄，期間相隔 22 個月。從上述出入境紀錄顯示，申請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不在澳門；

(5) 申請人透過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申報其本人現居於“香港 XXX”(見第 1 頁)，再配合申請人入境本澳的期間及次數，反映申請人未在本澳設有慣常居所；

(6) 申請人表示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澳門和香港的之間的入境限制政策，導致其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須指出的是，申請人只需要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及要求便能入境澳門，再者，根據申請人 2019 年的出入境紀錄，整年留澳日數亦只有 13 日，即使在疫情爆發前申請人亦長時間不在本澳，客觀反映，疫情並非妨礙申請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在本澳通常居住的原因；

(7) 被授權律師指出，申請人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大半生都在香港生活，可見申請人在香港有很多責任和利益，無論是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專業或商業利益等。須指出的是，申請人自 2018 年 9 月 3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自該日起已具條件在本澳開展日常事務，然而，透過是項申請所提交的文件，除了受聘於本澳僱主外，未能體現申請人與本澳存有更多的連繫，反映其日常事務圍繞香港開展，並以香港為生活中心，因己意不在本澳居住及生活屬個人選擇，不屬於合理障礙；

(8) 正如授權律師所引述的司法判決的觀點，“通常居住”為一不確定概念，而對於是否滿足這一不確定概念，則須由行政當局按照具體情況作出價值性評價及衡量。然而，經按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作分析，未能證實申請人在本澳通常居住；

(9) 經進行聽證程序後，未發現阻礙申請人在澳門居住的合理理由，或屬暫時不在澳門之情況，綜合上述情況，反映申請人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8. 綜上所述，鑒於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然而，按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資料顯示，申請人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經進行聽證程序，且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所指之各種情況，顯示上述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故此，建議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行政長官透過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所授予的權限，並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及第三款之規定，不批准申請人(A)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請批閱”

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作出了如下批示 (詳見卷宗第 22 背頁)：

“根據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並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3)項及第 3 款的規定，不批准申請人的續期申請。”

司法上訴人對上述決定表示不服，遂於 2023 年 3 月 13 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司法官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n.º 1 e na alínea d) do n.º 2 do artigo 69.º do CPAC, o Ministério Público vem emitir parecer nos termos seguintes:

1.

(A), melhor identificada nos autos, veio instaurar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o act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de indeferimento d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EM), pedindo a respectiva anulação.

A Entidade Recorrida, devidamente citada, apresentou

contestação na qual pugnou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2.

(i)

(i.1)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arece-nos que a Recorrente não tem razão. Procuraremos, de modo breve, justificar.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23.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é subsidiariamente aplicável aos interessados que requeiram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os termos do presente diploma o regime geral de entrada, permanência e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correndo da letra da norma transcrita a imposição da aplicação subsidiária do regime legal resultante da Lei n.º 16/2021, às situações em que tenha sido autorizada 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ao abrigo daquele Regulamento, sem que se estabeleça qualquer distinção consoante o fundamento dessa autorização. Por isso, também nas situações em que o fundament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é a concretização de investimentos nas RAEM, a lei exige, como condiçã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que os interessados residam habitualmente na RAEM, tal como, de resto, os nossos Tribunais têm vindo a decidir de modo reiterado (assim, por exempl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irado no processo n.º 182/2020, embora, nesse caso, não estivesse em causa uma situaçã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com fundamento em investimento e, no mesmo sentido, os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roferidos nos processos com os n.ºs 993/2021, 1053/2021 e 17/2022).

Compreende-se, aliás, a uma certa luz, o sentido daquela exigência atinente à residência habitual. Com efeito,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é concedida na perspectiva da futura aquisição do estatuto da residência permanente por parte dos interessados e esta, como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igo 24.º da Lei Básica e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8/1999, depende de que tenha havido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durante, pelo menos, sete anos consecutivos.

(i.2)

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é um pressupost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temporária de residência. É isso o que resulta da norma d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a qual é aplicável à situação em apreço em virtude da norma remissiva constante do artigo 23.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segundo a qual «é subsidiariamente aplicável aos interessados que requeiram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os termos do presente diploma o regime geral

de entrada, permanência e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Sobre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parece-nos de salientar que, antes da entrada em vigor da Lei n.º 16/2021, os nossos Tribunais tenderam a construir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fazendo-o coincidir com o lugar onde determinada pessoa fixou com carácter estável e permanente o seu centro de interesses vitais, o centro efectivo da sua vida, constituindo, portanto, o local em torno do qual gravitam as respectivas ligações existenciais. Deste modo, sempre se afastou do conceito o local que serve de mera passagem, ou aquele no qual uma pessoa está por curtos e intermitentes períodos de tempo (veja-se, por exemplo, neste senti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irado no processo n.º 182/2020).

Além disso, na densificação d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relevante em matéria atinente ao estatuto de residente da RAEM, têm também sido chamadas à colação as normas dos n.ºs 3 e 4 do artigo 4.º da Lei n.º 8/1999. Da norma do n.º 3 do artigo 4.º do mencionado diploma legal [com o seguinte teor: «para os efeitos d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referido nas alíneas 2), 5), 8) e 9) do n.º 1 do artigo 1.º e da perda do direito de residência referida no n.º 2 do artigo 2.º, a ausência temporária de Macau não determina que se tenha deixado de residir

habitualmente em Macau»] resulta qu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é compatível com a ausência temporária da Região (veja-se, neste mesmo sentido de que a ausência temporária não implica a quebra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13.11.2019, processo n.º 106/2019 e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2.7.2020, processo n.º 473/2019) e, do n.º 4 do artigo 4.º da Lei n.º 8/1999 resulta, por sua vez, que, em caso de ausência temporária do residente, na determinação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relevam as circunstâncias pessoais e os motivos da ausência, nomeadamente: 1) o motivo, período e frequência das ausências; 2) se o ausente tem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3) se é empregado de qualquer instituição sediada em Macau; 4) o paradeiro dos seus principais familiares, nomeadamente cônjuge e filhos menores.

Finalmente, com a entrada em vigor da Lei n.º 16/2021, verificou-se um alargamento d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para os efeitos aí previstos. Com efeito, através da norma do n.º 5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o legislador veio esclarecer que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relevante enquanto pressupost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ão exige que Macau constitua o centro efectivo da vida pessoal e familiar do interessado, o qual nem sequer precisa de

aqui ter a sua habitação para pernoitar, porquanto, como resulta expressamente daquela norma, «não deixa d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o titular que, embora não pernoite na RAEM, aqui se desloque regular e frequentemente para exercer actividades de estudo ou profissional remunerada ou empresarial». Assim, ao lado das pessoas que em Macau fixaram com carácter estável e permanente o seu centro de interesses, o centro efectivo da sua vida, e que, por isso, residem habitualmente em Macau, também em relação às pessoas que aqui apenas exercem uma actividade, seja académica, seja profissional, seja empresarial, ainda que aqui não vivam, se tem de considerar, face ao critério legal, que aqui residem habitualmente, desde que aqui se desloquem «regular e frequentemente» para exercer tais actividades.

(i.3)

Face aos elementos de facto que fluem dos autos e que constituíram 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do acto recorrido, parece-nos legítimo concluir que, como a Administração também concluiu, a Recorrente, no período temporal considerado, isto é, entre 3 de Setembro de 2018 e 31 de Agosto de 2021, não tev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Com efeito, resulta daqueles elementos que, durante esse tempo, a mesmo aqui permaneceu durante 10 dias em 2028 e 13 dias em 2019, não tendo estado em Macau qualquer dia durante os

anos de 2020 e 2021. Mais. Entre 4 de Outubro de 2019 e 31 de Agosto de 2021, não entrou em Macau uma única vez. A partir desta factualidade, facilmente podemos dizer que, no período em causa, a Recorrente não chegou a estabilizar a sua vida em Macau, não tendo, pois, chegado a constituir aqui o centro permanente dos seus interesses existenciais mais relevantes, uma vez que, parece-nos evidentemente incompatível com uma conclusão nesse sentido, o facto de aqui ter permanecido por tão pouco tempo.

Por isso, com todo o respeito por outro entendimento, estamos também convictos de que não é legalmente viável procurar enquadrar a situação da Recorrente, no que concretamente releva tendo em vista a solução do presente litígio, no conceito de ausência temporária previsto na norma do n.º 3 do artigo 4.º da lei n.º 8/1999. Na verdade, em nosso modesto entender, faz sentido falar de ausência temporária de Macau em relação a situações em que, antes dessa ausência, havia presença em Macau, e, portanto, residência habitual, o que, no caso, não ocorre.

Além disso, não se demonstra que a Recorrente se tenha deslocado com regularidade e frequência a Macau, e, portanto, não se mostra preenchido um dos requisitos do conceito legal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plasmado no n.º 5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Deste modo e como acima afirmámos, estará, parece-nos,

plenamente justificada a conclusão da Administr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faltava um pressuposto indispensável à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Recorrente, qual seja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iii)

A Recorrente também alegou, sem substanciar, que o acto recorrido sofre do vício resultante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ou da protecção da confiança.

Parece-nos, contudo,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que labora em manifesto equívoco.

De acordo com o entendimento que nos parece preferível, a operatividade do princípio da tutela da confiança depende de diversos pressupostos, a saber: a conduta de um sujeito criadora de confiança, sem violação de deveres de cuidado que ao caso caibam; uma situação, justificada objectivamente, de confiança baseada em elementos do caso que lhe atribuam razoabilidade; um investimento de confiança consistente no sujeito confiante ter assentado actividades jurídicas claras sobre as expectativas criadas, um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actuação geradora de confiança e a situação de confiança, por um lado e entre a situação de confiança e o investimento de confiança, por outro e a frustração da confiança por parte do sujeito jurídico que a criou (na jurisprudência comparada,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o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de 21.09.2011, processo n.º 753/11, disponível para consulta em linha e na doutrina, MARCELO REBELO DE SOUSA/ANDRÉ SALGADO DE MATOS, Direito Administrativo Geral, Tomo I, 3.ª edição, Lisboa, 2008, pp. 222-223 e ainda, em termos não inteiramente coincidentes, PEDRO MONIZ LOPES, Princípio da Boa fé e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Coimbra, 2011, pp. 279-286).

Ora, no caso, parece-nos que se não verificam os enunciados pressupostos, desde logo e decisivamente, por não vir alegada qualquer conduta da Administração que tivesse sido ou sequer pudesse ter sido criadora de expectativas na Recorrente quanto à irrelevância do local d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para a manutenção e para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A Administração limitou-se, como legalmente lhe competia, tendo em vista a decisão sobre 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formulado pela Recorrente, a proceder às diligências instrutórias que se lhe afiguraram necessárias para o apuramento da questão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uma vez que a manutenção da mesma é necessária, em princípio, ao deferimento daquela renovação, nos termos que resultam do disposto no artigo 43.º, n.ºs 2 e 3 da Lei n.º 16/2021. Não houve, pois, segundo cremos,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a que alude o artigo 8.º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iv)

Finalmente, também nos parece que o acto recorrido não pode ser anulado com fundamento n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Como sabemos, 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actividade administrativa só assume relevância invalidante nas situações em que a mesma seja manifesta, ostensiva, evidente (cfr. alínea d) do n.º 1 do artigo 21.º do CPAC). Como aponta a melhor doutrina, «no que concerne ao controlo efectuado com base nos princípios jurídicos, apenas a sua violação ostensiva ou intolerável (desvio de poder objectivo) poderá basear a anulação jurisdicional dos actos praticados ao abrig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variando a intolerabilidade de tal violação na medida da densidade do princípio em causa e dos circunstancialismos concretos em presença» (assim, por todos, FERNANDA PAULA OLIVEIRA, *A Discricionariedade de Planeamento Urbanístico Municipal na Dogmática Geral da Discricionariedade Administrativa*, Coimbra, 2011, p. 105). É precisamente este, também, o sentido que tem sido, nemine discrepante, seguido pelos nossos Tribunais (por todos, e entre muitos outros, cfr. os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30.04.2019, processo n.º 35/2019, de 23.06.2021, processo n.º 55/2021, de 23.07.2021, processo n.º 89/2021, de 24.09.2021, processo n.º 110/2021).*

A verdade é que, no caso, ao invés do que vem alegado pela Recorrente, estamos em crer que o acto recorrido não violou de modo intolerável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em qual das suas dimensões ou subprincípios em que tradicionalmente se analisa: adequação ou idoneidade; necessidade e proporcionalidade em sentido estrito.

Importa salientar, que não cabe ao Tribunal sindicar o mérito da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o juízo de conveniência que nessa decisão se consubstanciou. É à Administração, e só a ela, que, no exercício de valorações próprias e autónomas, compete avaliar, tendo em vista a concreta prossecuç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 se, na situação em causa, se justifica ou não autorizar a residência.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somos de parecer de que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

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 21/2004 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司法官已就本司法上訴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發表了詳盡且精闢的意見，本院合議庭完全採納了有關意見。這些意見為解決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另外，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 143/2021 的合議庭裁判中曾提

到：

“不能忽略的是，上述“通常居住”的概念是一個可以被法院審查的“不確定概念”，它必然意味著(正如本終審法院曾指出的那樣)「一個具有一定時間跨度及質量程度的“事實狀況”，因為該身份還要求具備某種“連結因素”的性質，顯示出“與某地”(或地區)“具有緊密且實際的聯繫”，有在此地居住以及擁有和維持居所的真正意圖。」，同時亦要知道的是「不僅僅要求“親身出現”在某一地區作(單純的)“逗留”(即所謂的“體素”)，而且還要求在逗留時具有(真正的)“成為該地區居民的意圖”(“心素”)，這個意圖可以通過其個人、家庭、社會及經濟日常事務等多個能夠顯示“切實參與及分享”其社會生活的方面予以評估。」

(...)，同時根據(新)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的規定——基於此規定和第 97 條的規定，已對現上訴人的情況作出“重新評估”，(...)。其實，這個(新的)法律規定並沒有摒棄(相反還要求)利害關係人(即使不留宿，也要)“頻繁及有規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就學、從事有償職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這項要件。”

在本案中，正如檢察院司法官在意見書中所述，上訴人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停留了 10 天和 13 天。而在 2019 年 10 月 4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間(接近兩年時間)，司法上訴人未曾踏入澳門一步。

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停留的日數很少，且入境澳門的次數並不頻繁，這難以顯示出其與澳門特區具有緊密且實際的聯繫。此外，其在澳門的停留情況也不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所規定的“頻繁及有規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企業活動”的要件。因此，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我們不能認定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

居住。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A)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司法上訴人需承擔 8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4 月 18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馮文莊

(第二助審法官)

米萬英

(助理檢察長)